

引用格式:毛妍君,王影菊.论初唐“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0(2):29-35.

# 论初唐“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

毛妍君, 王影菊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 “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西魏至隋唐之际,“关陇集团”为了加强统治实行了“关中本位”文化政策,这一政策不仅维护了其在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绝对主导权,而且对当时的文学特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文学特质的形成既有现实的政治基础,又有唐代胡汉文化对峙、融合的独特复杂性。从深层次上来说,唐代文学的特质源于儒家文化的向心力,及其兼收并蓄的文学观,从强调文学为政治的附庸,转向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并最终形成“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唐代文学特质。

[关键词] 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文学特质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005(2022)02-0029-07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系统提出“关中本位”“关陇集团”以及“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创了新方法,同时也很好地阐释了西魏到隋唐之际的文化发展脉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根本目的是维护其统治的稳定,但在客观上也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太宗时期,对这一文化政策进行调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山东和江南地区的文学传统,为唐代独特文学风貌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就唐代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其文学的影响展开相关论述。

## 一、“关中本位”文化政策

宇文泰所带领的“关陇集团”及其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对之后的政治统治及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寅恪先生认为,“关陇集团”的凝聚与分化,影响着统治阶级的变迁。宇文泰调和胡汉文化,凝聚力量以稳固西魏政权,创其霸业,从而形成了“关陇集团”。陈先生由此指出:“盖宇文泰当日融洽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即其代表也。”<sup>[1]47</sup>“关陇集团”自宇文泰建立之后,一直持续到唐初,以李世民为核心的“关陇集团”对“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收稿日期] 2022-01-15 [修订日期] 2022-03-15

[作者简介] 毛妍君(1974—),女,陕西西安人,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王影菊(1997—),女,陕西蓝田人,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1GJ002)

### (一)“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渊源

以宇文泰为代表的关陇政权面临着来自江南、山东两地更为强大政权的威胁,不得不吸取前朝覆灭的惨痛教训,励精图治,团结关陇地区的汉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关中本位”政策也由此应运而生。而“关中本位”政策的实施,使宇文泰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加强了内部团结,也奠定了此后隋唐统治的基本政治模式。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这样描述:“西魏,宇文泰虽系鲜卑,然因传统势力入关者少,更得极速汉化,苏绰、庾辩等人,卒为北周创建了一个新的整治规模,为后来隋唐所取法,将来中国全盛时期之再临,即奠基于此。”<sup>[2]315</sup>这种治理模式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对“礼乐”的强调,从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相互配合,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从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巩固统治。这一政策不仅包含了物质文化层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其精神文化方面的考虑。陈寅恪先生对此详细说明:“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要言之,即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sup>[3]91</sup>以宇文泰为核心的“关陇集团”,为了应对山东和江南两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压力,树立“关陇文化”在主流文化领域内的正统地位,故而实施“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有效地抑制了这两个地区文化对其统治的威胁,确立了“关陇文化”在文化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从而很好的巩固了其政权的稳定。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文化政策,但因其过于武断和严苛,遭到了山东和江南地区的反抗。这一政策在唐代经过改良后,对其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寅恪先生曾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sup>[4]303</sup>李唐王朝本就兴起于关陇地区的胡汉混血政权,有着昂扬、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加之其能有效处理三个地区之间的文化冲突,因此可以开创新局面。建国初始,高祖和太宗按照已有的政治传统,继续实施“关中本位”政策,将政权牢牢把握在以李氏为中心的“关陇集团”手中。在文化领域,太宗也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同时接受了江南、山东两地文化中的精华,解决了三个文化区域间的冲突,形成了以“关陇文化”为主体,其他地区文化共同发展的局面。

### (二)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北魏之后,江南、山东、关中政治文化区三足鼎立,最终关中文化区占据主导地位,在较量中脱颖而出。在此过程中,“关陇集团”所实行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宇文泰所带领的鲜卑族依靠武力征服了北方地区,入主中原,其自知文化落后,必须和当地汉人合作,才能使统治稳定,使政权更好的维持下去。因此,如何解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歧,构建自己的正统地位,成为关陇政权的核心问题。关陇地区本就是胡汉共存的地区,而“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正是融合胡汉文化的产物。宇文泰为了巩固政权,和当地汉人合作,在客观上使得儒学重新确立了正统地位。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为汉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孔子以仁释礼,通过“礼乐”制度,将社会外在规范的“礼”内化为个体的内在的“仁”,并且为后代文人志士确立了人生的理想追求,对汉民族文化心理产生深远影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文人志士遵循着儒家传统,努力向“大同”的境界奋进,他们只着眼于追求现实人生可以实现的理想,因此,不需要依靠宗教来祈求彼岸的幸福。但是自汉末以来,世家大族的腐败以及社会风气使儒家学说缺少了维系的土壤,儒学因此被玄学佛教文化冲击,退居次要地位,仅在少数留在北方的汉族中受到推崇。钱穆先生提到“汉族留北者,在当时皆以门第稍次,不足当‘清流雅望’之目,然正为如此,又能保守几许汉族较有价值之真文化,经动乱艰苦之磨砺而精神转新转健。”<sup>[2]315</sup>因此,“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实施,使得儒学重新走向正统地位,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文化核心之一,并开始重新影响文学的发展。罗宗强先生说:“就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发展而言,南朝是主流;而在以后的岁月里,当南北融合完成的时候,北方重气质的文学思想却成了核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涉及到我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涉及我国文学发展的总的趋向。”<sup>[5]319</sup>笔者认为罗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就是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民族心理,而我国文学发展的总趋向可能就是儒家重质而兼顾文采的总趋向。而唐太宗继续并发展了“关中本位”文化政策,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其他地区的文化,使得文质彬彬的文学发展总趋向终于在唐代完成了。

宇文泰实行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其政治统治起到了良好的巩固作用。一方面,儒家学说经

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正统地位已经确立。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提到：“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社会中，已经无孔不入的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已构成了汉民族的某种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sup>[6]30</sup>因而，宇文泰以儒学作为其文治的核心，不仅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也恢复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传统，加强了其政权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儒家本来就是强调积极入世的，能调动文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加之儒家还重视礼的规范性，这些可以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想的理论基础，更好地为政权服务。政治和文学有时是相辅相成的，政治影响学术，学术反过来又影响政治，使其统治愈加规范合理，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奠定良好的基础。“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又为隋唐所继承并加以发展，亦为唐代的繁荣兴盛、文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 二、“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作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反映了外部社会思潮对文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正如刘勰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sup>[7]244</sup>初唐“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实施，形成了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思想倾向，这对文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家的创作往往也向此靠拢，在一定程度上，此政策也促成了唐代文学独特的面貌。

### （一）黜文尚质的审美风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艺术的自觉时期，也是人的自觉时期。此时文学得到极大地解放，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进入六朝之后，由于统治阶级出身寒门，没有世家大族累世家风的熏陶，没有传统诗教的约束，人性中的低级趣味逐渐显露，走向对声色的追求，文学创作愈趋世俗化、狭隘化，也因此逐渐走向歧途。因此，政权稳定后，如何让文学更好的为政治服务，又成为宇文氏政权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命题。《周书·苏绰传》云，“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宇文泰）欲革其弊，因魏帝（西魏文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其词曰：‘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sup>[8]44-45</sup>苏绰等人是从维护政权稳定的角度出发进行文化改革，因此，《大诰》颁布之后把文学重新引入了那种古奥难懂、诘屈聱牙的传统，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是他们对文学“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功能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这一政策也在客观上成为不断牵制南朝文学愈趋狭隘化、娱乐化、绮靡化的强大力量，从而把误入歧途的文学拉回正确的轨道。宇文泰的改革，为文学重新树立了方向，文人创作大都以此为圭臬，唐瑾《华岳颂》的庄重、典丽。李昶《奉利重适阳关》《陪驾幸终南山》《答徐陵书》等作品的真情实意、风格质朴即是例证。王褒入北之后的大部分诗篇如《从军行》《燕歌行》等也显现出质朴豪迈的特点。这些作品表现了文人对周礼的认同以及儒家思想的回归。这一时期，文学总体走上了为政治服务的道路，成为政治的附庸，失去其独立的地位。对此，康震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到“宇文泰、苏绰奏行《大诰》，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同一性，是‘关陇集团’政治改革的产物，也是其文化策略的组成部分。”<sup>[9]</sup>“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是巩固政权的产物，因此，带有明显的形而上的特质。

隋文帝时期依然奉行宇文泰所推行的文化政策。隋文帝开皇四年（585），治书侍御史李谔上文帝《论文书》，猛烈抨击建安以来的文学，请求遏止华艳文风：“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sup>[10]1544</sup>无论是苏绰的《大诰》还是李谔的《论文书》，都只看到了浮靡文风对政治的戕害，片面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丧失了其独立地位，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一方面因为南朝灭国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唐太宗时期。另一方面，当时南朝文风的影响巨大，北朝文人竞相学习，统治者害怕南方的靡靡之音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因此，这一时期文学没有太大的发展。葛晓音先生对此提到“从魏到隋，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上无所建树，提出了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而又完全否定文学的艺术特点，以一种偏颇去反对另一种偏颇，带着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sup>[11]4</sup>虽然这一时期，文学发展非常缓慢，但是在文化领域有了统一的指导思想。

李渊即位之后，十分重视儒学，采取一系列措施，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武德二年，始诏国子学

立周公、孔子庙；七年高祖释奠焉，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九年封孔子之后为褒圣侯。”<sup>[12]243</sup>实际上，李渊并非真正仰慕儒学只是想借此巩固政权，所以这些措施只是前朝政策的因袭，依然未能妥善解决三大地域间的文化冲突。因此，李渊在位期间未能为新王朝构建一整套合理的统治理论。葛晓音先生认为“正统儒家屡屡标举以宗经颂圣的雅正观念为核心的诗教说，总不能有效的革除浮艳文风，根本原因还在于这种理论本身复古倒退的性质违背了文学的发展规律。”<sup>[11]32</sup>这一问题，在唐太宗时期才得到有效解决。即位伊始，唐太宗也遵行这一政策，其真心服膺儒学，十分重视儒学，并以此作为构建自己统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基础，以实现“文德政治”。唐太宗宣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sup>[13]3719</sup>并曾多次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肯暂无耳！”<sup>[14]331</sup>由于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势必影响到文人的创作心态。虽然南方的文风依然有很大影响力，大部分文士也对南方文学有所钦慕，但因为统治者的提倡，文人的创作逐渐向儒学的要求靠拢。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总体显现出“黜文尚质”的审美风尚。

## (二) 出将入相的人生理想

西北的黄土农耕环境和草地游牧生活造就了关陇人民豪迈坚韧、粗犷勇猛的民族性格和倔强不屈的文化心理，形成了他们重事功，积极进取的心态，所谓“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sup>[15]44-45</sup>动荡的战争环境造就出一批关陇豪族，他们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顽强的生命力和持久的稳定性。正如唐人柳芳《氏族论》所言：“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sup>[12]5679</sup>“关陇集团”骁勇善战，本就具有锐意进取，雄心勃勃的特性，加以儒学的熏陶、浸染，故能凭不屈之精神，坚韧之意志，逐渐成为一股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也正因此，关陇文人并不仅仅是一般士人，他们大部分能文能武，通常具有“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人生追求。陈寅恪先生这样描绘此种情形，“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帝与其将相大臣几乎全出于一系统之将领，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侯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帝亦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有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sup>[1]49</sup>“出将入相”也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人生理想。唐初，面对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局面，唐太宗认识到笼络和依靠新兴地主阶级以巩固政权的必要性，他需要贤能志士来帮他开创一个新时代，因此，他亲自撰文赞美曹操的“匡正之功”，以激励群臣中“渴慕宰相之贤者”，在诗歌中讴歌自己“提剑郁匡时”的功业和“舟楫仁时英”的襟怀，目的是鼓励贤良辅佐，倡导文人志士积极进取，建功立业。葛晓音先生指出：“促使初唐诗风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乃是他们所讴歌的功业本身对中下层文人精神风貌产生的影响。”<sup>[16]</sup>唐太宗求贤若渴，其开放博大的胸襟使得下层士人乐为辅弼，安邦治国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极大地鼓舞了文人的信心和勇气，形成了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的人生追求，以及文武不分的用人模式。士人思想面貌和精神状态发生了转变，势必会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六朝的靡靡之音，被一股青春的昂扬奋进精神所取代，“出将入相”成为唐代知识分子最高的人生理想。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文人志士竭尽所能展现自己的才华，“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约束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上层社会；他们满怀抱负，纵情欢乐，傲岸不逊，自己反抗。”<sup>[17]146</sup>初唐四杰的杨炯有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言壮语。骆宾王投身幕府，和徐敬业一起高举反武大旗。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一改往日离别之伤情而转为表达一种自信、旷达的豪情。他们身上已经可以看到一股欣欣向荣、积极进取的朝气。盛唐时期，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在文人志士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诗仙”李白在《上韩荆州书》中写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sup>[18]1239</sup>《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写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sup>[18]1220</sup>“诗圣”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sup>[19]2252</sup>在《前出塞九首·其六》写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sup>[19]2295</sup>以致在孩子的身上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为其起名“宗文、宗武”。就连“诗佛”王维也有“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sup>[19]1305</sup>的豪情壮志。甚至安史之乱后，李贺依然高唱“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sup>[19]4414</sup>这是时代风气使然，而这样的精神面貌无不可以追溯到武德、贞观时期实施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

### 三、“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统治者的相关政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不是直接的,它需要通过文化心理这个中介。文人的创作并非像镜子一样机械地反映现实,而是经过心灵的沉淀。文人的心理结构和创作个性体现了士人心态作为影响文学思想发展的内部因素的主导作用,从而影响文学的发展。“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实施影响了唐代文人的基本心理结构,从而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文人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唐代独特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追求。

#### (一)女性的解放与女性文学的兴盛

唐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精神。邓小军先生曾提到“唐代文化精神,是人性、人道、民本、崇尚人文、天人合一、个性自由伸展、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掉自己的精神之整合。”<sup>[20]592</sup>因而,文学发展到唐代,可谓五彩缤纷,蔚为大观,各种风格流派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女性文学的繁荣。唐以前有关女性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女性一直作为第二性,长期被人们忽视,偶尔提及,往往涉及到女性的容貌、体态,被当作取悦赏玩的对象,女作家更是屈指可数。到了唐代,不仅有关女性的文学作品增多,女作家也人才辈出,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全唐诗》收录的女诗人约有169人,上至宫闱后妃,下至市井平民。武则天不仅有着不让须眉的政治才能,她对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杜甫曾在诗《赠蜀僧闾邱师兄》提到:“在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sup>[19]2307</sup>统治者对文学的爱好,势必会促进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从现存的诗歌来看,她的诗风不仅显示出帝王的霸气,也流露出女性特有的缠绵与细腻。如《曳鼎歌》,既写出了对先王功业的敬仰,也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如意娘》则以女性敏锐的感受力写出了相思时自然的女儿本色。上官婉儿更是可以“称量天下文士”的才女,张说在其《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云:“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有女尚书决事宫闱。昭容两朝专美,一日万岁,顾问不遗,应接如响。虽汉称班婕妤,晋誉左嫔,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sup>[21]18</sup>上官婉儿在代表作《彩书怨》中以女性特有的口吻,写出了闺中女子独特、细腻的心理感受。全诗主要描写了闺中女子对丈夫的思念,诗人寓情于景委婉含蓄,全无感伤哀怨之情,还与家国相联系,突破了以往闺怨诗多哀婉凄怨的写作范式,展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是女性意识无意识的流露。此外《游长宁公主流杯池》《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等都表现了上官婉儿高超的创作技巧以及开阔的胸襟。“女冠诗人”鱼玄机、薛涛、李冶等,在唐代也名噪一时,留下了很多优秀的诗篇,她们由于特殊的身份,在诗歌中除了表现宗教生活外,还记录了情感生活,特别是那些表现情感纠葛的诗篇。薛涛的《春望词四首》,系统地表现了诗人对知音、对爱情的渴望。李冶的《寄朱放》“郁郁山木荣,绵绵野花发。别后无限情,相逢一时说。”<sup>[19]9155</sup>借景抒情,既写出了别后的相思,又表现出相逢的喜悦。鱼玄机《赠邻女》“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sup>[19]9145</sup>更是大胆批判了那些见异思迁之徒,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追求。这些女性诗人的诗作往往率真质朴,既是内心真情实感的流露,同时也是女性自主意识的展现。这些作品的出现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当时女性的所思所想,她们的作品,也为唐代文学大花园增添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而这一切都和“关陇集团”的文化传统,以及“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史书记载,北齐有尊女抑男的风俗,这一点从《颜氏家训·治家篇》中所述可见一斑:“邺下风俗,专以姑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唱和之礼,或尔汝之。”<sup>[22]38</sup>可见当时北方女性在家里的地位是很高的,到了唐代这个传统还一直保留。《旧唐书·郑善果传》载郑善果在隋任普郡太守时,“母崔氏贤明,晓于政道,每善果理务,崔氏尝于阁内听之,闻其剖断合理,归则大悦,若处事不允,母则不与之言,善果伏于床前,终日不敢食。”<sup>[23]150</sup>正是因为这种风气,女性自身的才干才会显现出来,从而为唐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总之,从北齐到唐初,女性的才能逐步被认识,获得了和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而男女相对平等的传统则借由“关中本位”文化政策保留下来,可以说,唐代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心态进一步促进了女性文学的繁荣。

#### (二)文质彬彬的文学风貌

唐代的文学不仅继承了“关陇集团”历代所积累的文学遗产,并且借鉴、吸收了南朝文学的华美辞

藻和艺术技巧,为日渐走入“歧途”的南朝文学注入了“质”的因子,重新激发起生命的活力,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文学面貌。陈寅恪先生提到“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sup>[24]75</sup>而唐代的文化精神、文学风貌和唐太宗实施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及其开放包容的文学观密切相关。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洗涤了南朝的浮靡文风,又使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对文学特性的自觉探索得以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文质彬彬”的文学风貌。南北文风的融合之所以能在唐太宗时期得以进行,正是因为唐太宗开放的文艺观念,他并不认为文学有害于政治,他的文艺观和政治观是分开的。贞观二年,祖孝孙创作了唐雅乐,奏给太宗听,太宗说:“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sup>[25]588</sup>与此相应,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若能取江左清奇的文辞,河朔刚贞的词义,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齐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sup>[10]1730</sup>明确地提出了融合南北文风之长的主张。唐太宗及其身边的文人不仅是这一主张的提出者,也是这一主张的践行者。唐太宗本人对文学也颇有造诣,在创作过程中,虽然倾慕南方文风,但他往往会克制自己,他的《帝京篇》正是如此。《帝京篇》共十首,通过对长安盛景以及帝王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一代帝王的阔大胸襟和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彭定求等人把唐太宗的组诗《帝京篇》作为《全唐诗》的开卷之作,寓有深刻含意。胡震亨言:“太宗文武间出,首辟吟源。”<sup>[26]44</sup>此外《咏饮马》《咏弓》等作品也写得雅正富丽。在唐太宗带领下,虞世南的相关作品也褪去了浮艳之风,更加纯净,他的应制诗如《侍宴归雁堂》写的富贵典雅,他的乐府古题诗《拟饮马长城窟》等辞采典丽,借助相关景物的烘托,写出了战争的残酷。李百药的诗歌,无论是咏物诗《渡汉江》,还是应制诗《和许侍郎游昆明池》和艳情诗《咏萤火示情人》也都显露出雅致的格调,而无浮靡之气。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这种融合开放的文学观才得以形成并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继续发展。而这种开放的文学观念早在太宗做秦王时就开始形成了,当时王府聚集了所谓的“十八学士”,他们来自不同地域,各有所长。秦王李世民《置文馆学士教》言:“或背淮而至千里,或适赵以欣三见,咸能垂裾邸第,委质藩维,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词而咏风雅,优游幕府,是用嘉焉。”<sup>[27]49</sup>在政权稳定之后,他仍然重用这些东南文士,对此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曾提到:“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sup>[28]卷192</sup>这表明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关陇集团”正在逐步抛弃狭隘的文化观念,形成大一统国家所需要的兼收并蓄的文化观念。罗宗强先生说“唐文学的繁荣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朝代的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唐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sup>[29]38</sup>而正是这个良好开端为唐代“文质彬彬”的文学风貌奠定了基础。

宇文泰建立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奠定了隋唐文化发展的基础,也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给文学注入了“质”的因子。初唐继续实施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以开阔心胸兼收并蓄江南及山东文学的形式技巧,对唐代文学的特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文学特质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政治环境,又有着胡汉文化对峙、融合的独特复杂性,而儒家文化的向心力使得以李唐为代表的“关陇集团”文化取得了最终胜利。“关陇集团”所具有的那种重事功、积极进取的心态,奠定了唐代蓬勃向上、昂扬奋发的感情基调;尚质而又兼收并蓄的文学观,也把文学逐渐引向了文质彬彬的蓬勃发展方向。

## [ 参 考 文 献 ]

- [1]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2]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3]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
- [4]陈寅恪. 唐氏族之推测后记[M]//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5]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 [6]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7]刘勰.文心雕龙[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 [8]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 [9]康震.南北朝时期“关陇集团”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J].文学评论,2008(2):25-29.
- [10]魏征.隋书:卷六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1]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1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礼乐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3]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4]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M].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5]曹道衡.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和散文[M]//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6]葛晓音.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1985(2):191-208.
- [17]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8]李白.李太白全集[M].清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9]彭定求.全唐诗: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20]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
- [21]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2]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第五[M].檀作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3]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4]吴宓.《空轩诗画》录陈氏语[M]//蒋天枢.陈寅恪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5]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26]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7]董诰,等.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8]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9]罗宗强.隋唐五代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责任编辑:陈曦 责任校对:周珂]

## On Literary Influence of Guanzhong – standard Cultural Policy in Early Tang Dynasty

MAO Yanjun, WANG Yingj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8)

**Abstract:** Guanzhong – standard cultural policy is a concept proposed by Mr. Chen Yinque. In dynasties of Wei, Zhou, Sui and Tang, the Guan – Long group put Guanzhong – standard cultural policy into effe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rule, which maintained its absolute dominance in the mainstream cultural ideology and influenced its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In Tang Dynasty, th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resulted not only from the realistic politics but also from the distinctive complexity of the confront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es of Hu and Han. In a deeper sense, th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are due to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Confucian culture and its inclusive literary concepts, which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of position from the dependence to politics to the independence of literature so that th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came into being with features of elegance and perfection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Guan – Long group; Guanzhong – standard cultural policy;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